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

孙晶

著

WENHUA SHENGHUO CHUBANSHE YU XIANDAI WENXUE

教育出版社

96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

孙 晶

广西教育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

孙 晶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9.125 印张 插页4 193 千字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435-2823-1/G·2132 定价:25.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序

1980年间,我在复旦大学读大三的时候,与同学李辉相约研究巴金思想和创作。渐渐地我们进入了巴金的传记领域,相继拜访了当时尚健在的老人毕修勺、吴朗西、柳静、杨挹清、吴金堤、吴焯炘、李济生和陆蠡的夫人张宛若,其中有些老人后来与我成了忘年之交。这些老人都是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人马,一谈起文生社都充满感情,仿佛又是回到当年的理想主义时代。后来我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里写到访问吴朗西先生的情景:“吴先生还患着帕金森氏症,说话的时候,嘴唇、手足都颤抖着。当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慢慢建立起来以后,一次笔者问起当年文生社同仁为什么能以这样崇高的理想来待事业,吴先生回答: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说这话的时候,吴老浮肿的脸庞舒展开来,细长的双眼也放出了光彩。笔者顿时就感受到一种人格力量弥漫在破旧的屋内。”这决不是文学笔法,那间破旧的屋子正是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旧址,在上海西区金陵路和长乐路之间的老式石库门弄堂杨家弄里(现在因造高架桥已

经拆迁)。我当时突然被启悟：这正是安那其的只讲奉献、不计报酬的人格原则，正是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三大信条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具体体现，正是20年代巴金苦苦翻译《伦理学》所要宣传的人生哲学，也正是30年代闽南、广东的“耶稣”们（指叶非英等教育家）在教育事业上所遵循的人生道路。20年代末巴金从法国回到中国，满心想参加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可是当时由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白色恐怖，无政府的社会运动早已烟消云散，他深深地陷入绝望。于是用他的笔，写出了一篇篇控诉专制、呼唤抗争的作品，其痛切、其凄厉都震撼了青年读者的心。过去评论者都认为这是巴金找不到出路的呼喊，其实巴金心中又何尝没有预设的理想和出路？这一点他从未动摇过，只是他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这样的运动来寄放他的心，这才像广场上的孤魂厉鬼，惨叫不已。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巴金出任总编辑，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实践开辟了一个精神的乌托邦，他们不计名利，不为赚钱，都默默地用义务劳动的态度来办好一家出版社，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以后，巴金再也不诉说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了，再也不呼唤空洞的光明与出路了，路就在脚下，踏踏实实地走向自己的理想。我由此想到了“岗位”一词，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不正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吗？思想、教育、出版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理想载体，不正是靠知识分子自己有意识地去实践，慢慢地接近理想境界吗？

当然，如上的一些想法，也是在以后的学术实践中逐渐体会到的，但研究文化生活出版社从那时起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我想通过一家出版社的兴衰史来看一种理想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实践所产生的作用，同时也看知识分子如何靠着理想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

随着学术研究和 90 年代社会实践的深入,我越来越体会到,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命运是与现代出版事业密不可分的,或也可以夸张地说,是先有了现代出版事业,才会有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化和文学思潮。100 年前,也就是 1898 年,戊戌维新失败了,但它不但酝酿出一个京师大学堂,也孕育了现代出版业的诞生。那一年张謇、蔡元培、张元济都从北京逃亡到上海,一个改换门庭从事现代实业终于发迹,一个在庙堂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徘徊,竟推动了现代教育的诞生,而张元济则从事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出版事业,探索出一条由庙堂转向民间岗位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道路。从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到巴金、吴朗西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形成了三代出版家:第一代以张元济为代表,他基本上代表了旧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代,虽然筚路蓝缕开创了现代出版事业,但其从事的出版工作,仍然有意无意地贯穿了国家精神,这与蔡元培在开创现代教育事业的时有意无意地体现了国家精神是一样的,他们都属于过渡的一代人物,较后的王云五、李石曾等也可属这一代人。第二代可以从辛亥年以后逐渐崛起的一些出版商人如陆费逵等人算起,“五四”后风云际会的赵南公、李小峰、张静庐等也属此列,他们对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对新文化事业也有感情,他们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投入新文化运动,在获取利润的同时推动新文化。这一代出版家多有两重性,在目标一致的时候有可能成为作家们的朋友,为了商业利益也会与作家们发生冲突。但这一代出版家在现代出版事业与现代文化市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机制,使出版直接与市场发生关系,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精神。第三代出版家则是指二三十年代逐渐出现的一批直接参与了出版实践的分子,如邹韬奋

4

(生活书店)、叶圣陶夏丏尊等人(开明书店)、巴金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胡风(希望社)等,这些出版社大都办得很成功,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风貌,又推动和繁荣了现代出版事业。当然不是说知识分子办的书店专爱赔钱,但他们的成功经验证明了用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来从事社会实践本身是可行的。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皇上恩赐的,当知识分子脱离了传统庙堂仕途以后,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实践来探索自己的价值取向所在,来重新梳理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新道统,而现代出版事业,正是知识分子不妨走一走的道路。就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例,最初完全是逆着社会潮流而动的。1933年为杂志年,各家出版社一哄而上抢出杂志,据有关材料统计1934年全年的杂志数量,上海出版215种,南京39种,杭州10种,北京5种,广州、武汉各3种,天津2种,镇江、济南、安庆各1种,可见上海出版杂志的风头之健。但就在这时候,文化生活出版社却逆风而动,不出杂志反倒出单行本、出大型丛书,而且还以文艺图书为主。虽然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会赔钱,但巴金吴朗西等坚持这样做了,也是人弃我取的原因,结果文化生活出版社反倒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现在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话,很可能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将有另外一种写法。

这三代出版家的产生有先有后,但并不是互相交替禅让,总的来说,第三种出版家仍是少数,在今天依然是空谷足音。1949年以后出版事业被收归国有,成为彻底的国家意志的产物,后两种出版家都被扫荡,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与国家意志双重制约了出版事业,现代出版业真是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对研究现代出版史及其社会实践产生强烈的兴趣。

5年前,我着手筹划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没有几个钱,但以创品牌的方针来策划火凤凰系列出版物,相继编辑出版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和《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等,已出版的85种,如将与之相关的系列图书相加,总也近于百种,尽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探索如何将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成果与文化市场相沟通的义务。我一开始就是自觉地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知识分子理想为实践目标,并得到了巴金老人的首肯和大力支持。可惜吴朗西、毕修勺等老人已经去世,如果他们健在的话,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并给我以温暖。这5年中我有幸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对现代出版的有意识的实践越来越多,虽然也积累了不少难以言状的社会经验,但总的来说,我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在民间建立理想岗位的实践是有信心的。

也正是出于这些体会,我对于研究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现代出版史、探讨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兴趣越来越浓厚。几年里自己也陆陆续续地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比如与李辉合作写过《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史料性长文,在后来有关巴金的论著中,我也一再提出了有关现代出版方面的学术见解。所以当钱理群先生策划一套《文学与出版丛书》并鼓励我加盟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了。不过令我惭愧的是,热心答应是很容易,但真要孜孜到底写成一本书却又是另一回事,到了真正着手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像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要有一段集中的时间,让我在图书馆里重新阅读当年的出版物,慢慢地唤起我最初的感觉。可是我缺少的正是时间,我手头上教学工作、研究计划和社会活动像一群围追着我的狗一样,狂吠乱咬,让人生出走投无路之感,不知如何是好。就这样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眼看期限

将近,万难中幸好有我的博士生孙晶主动为我分担了这一任务。她花了将近两个学期的时间,天天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物,几乎读完了近三百种图书,并认真做了笔记。她也许也被这一新开垦的研究处女地所深深吸引,所以决定拿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在我的具体指导下,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书中有关现代出版和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也加上了她的研究心得和主观认识,尤其是对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型丛书的研究,完全体现出她的扎扎实实的学术功力。如果需要我推荐这部书稿的话,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孙晶的研究态度。现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大约能埋头读两三百本书,然后再认真做论文的比较少见。我接触过不少年轻人,都是极聪明的,他们读了几本国外翻译过来的理论书,然后就断定以前的研究如何不行,然后再搜集几个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例子,然后就做成了“观点新颖”或者“有理论深度”的论文。而孙晶的论文看得出来相当老实,她扎扎实实确实读了那么多的书,并从中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想法。如她发现了同一个作家总是把艺术性较强的书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把一些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著作给了别的出版社。虽说这种现象恐怕也是有着千变万化的理由,不能一概而论,但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本身仍然有助于我们对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个性的理解。又如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戏剧作品,不但载了剧本,往往还保存了舞台演出的资料,由此引出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对戏剧出版的独特贡献。这些看法虽然没有罗兰·巴特或者海德格尔那么耸人听闻,但我觉得对于现代文学研究也许是更有价值。学术见解的价值可能有大小,但我觉得要从文学史现象本身提出问题,产生思想,这是首先应该走好

的道路。

这本书稿服从于丛书的策划思想,所以偏重对出版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考究,而对出版社在其他方面的历史——如无政府主义理想问题、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全过程及其人事关系,等等,谈得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只是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研究的第一步,希望有人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下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把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

陈思和

1998年8月16日

于黑水斋

目 录

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序	陈思和 (1)
绪论	(1)

1

上编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作家

第一章 生命花朵的绽放: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21)
第二章 文化的圆心:鲁迅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35)
第三章 巨星从这里诞生:曹禺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48)
第四章 身手多面的李健吾:李健吾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62)
第五章 不朽的人与文:靳以、陆蠡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74)
第六章 是芦苇还是号角:何其芳(兼论京派)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86)
第七章 荷香与星光:“九叶派”及其他青年作家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101)

下编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物研究

第一章 《文学丛刊》研究·····	(113)
第二章 文学翻译类丛书研究·····	(149)
第三章 抗战期间的出版物研究·····	(220)
结语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影响及其他·····	(248)
附录	
附录一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	(259)
附录二 文化生活出版社重要丛书作品目录·····	(267)

绪 论

20 世纪始,现代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明的构建,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一批由知识分子亲自主持的出版机构,共同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出版氛围,创建了一个张扬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文化阵地,开辟了一条承传知识分子精神意志的重要途径。文化生活出版社即是这样一家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始终贯穿其间的出版机构。

30 年代伊始,在世界经济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上海工商界也面临连年萧条、经济不断衰退的局面。在文化产业方面,当时一般的书店出版社都争着出销量大、周转快的刊物杂志,而不愿意出版单行本。1934 年和 1935 年这两个年头更是被称做“杂志年”。对此,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起人之一的吴朗西回忆说:“当时不景气的风已经吹到上海工商界身上来了。书店出版社争出销数比较大、资金周转比较快的刊物杂志,至于单行本,一般连创作的小说都不愿意出,

更不用说翻译小说了。”^① 关于这种状况,鲁迅在致孟十还的信中说:“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是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② 而1935年,他在写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更是指出:“上海今年的出版界,景象比去年坏。”^③

就是在这样一种出版业很不景气的状况下,吴朗西、伍禅、丽尼、陆蠡、巴金一些年青人走到一起,聚到一起,创办了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学史上都留下重要影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正如吴朗西回忆说:“当时书店都不大愿意出单行本,我们就来填补这个空白。……把这个书店(即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共同的事业,培育它,扶持它,切切实实,认真真地干吧。”^④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最初发起人是吴朗西与伍禅,他们都是留日学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怀抱一腔报国热情相偕回国。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直接动因是由于他们的朋友、散文家丽尼翻译了一本纪德的名作《田园交响乐》,想找一家书店出版,却四处碰壁,找不到一家书店接受。当吴朗西得知丽尼想出版译作而不能时,便和伍禅、丽尼几人商量一起来办一个出版社。构想之初,本来是打算专出外国的文艺书,然而考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刚刚出生,“头一炮一定要打响才行”,而“《田园交响乐》尽管是一本优秀的创作,但读者中知道纪德的不多。这本书对一般的读者是不会有吸引力的”^⑤。于是,他们决定首先把美国政论家约翰·史蒂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④ ⑤ 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82年3期。

② 鲁迅《致孟十还》(1934年12月4日),《鲁迅书信集》6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 鲁迅《致曹靖华》(1935年2月18日),《鲁迅书信集》7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介绍给读者。这虽是一本政治读物,不属于文艺范畴,却也是一本好作品,尤其在当时的中国更有其推广的意义与价值。只是这样一来,在体例方面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吴朗西等改变了原来只出外国文艺书的打算,而是借鉴美国《万人丛书》、日本《岩波文库》的编辑方式,计划出版一套综合性丛书,其中“有文学,有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有翻译的,也有创作的”^①,并把这套新生的丛书取名为《文化生活丛刊》(由于当时吴朗西编过《美术生活》与《漫画生活》两本刊物,便为其命名为《文化生活丛刊》)。值此,文化生活出版社第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于1935年5月正式创刊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正式成立,其时社名为“文化生活社”,9月份改称“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丛刊》始创时,巴金并不在国内。但由于吴朗西等认为“巴金在当时已是拥有广大读者的有名作家,他有搞编辑工作的经验,他做事认真、负责”^②,便邀请巴金回国主编《文化生活丛刊》。巴金知道了吴朗西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消息后,十分支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业,把自己的一本译作《狱中记》、一本著作《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交给《文化生活丛刊》出版,并欣然接受了邀请,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

巴金回国后,一面主编《文化生活丛刊》,一面开始着手编辑一套《文学丛刊》。巴金1934年在北京与郑振铎、靳以一起编《文学季刊》时,曾为立达书局编过一套10本的文学丛书,作者主要是当时北方文坛的新秀,包括沈从文的《八骏图》、曹禺的《雷雨》、卞之琳的《鱼目集》、李健吾的《以身作则》等。立达书局曾支付了300元稿酬,但因

① ③ 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82年3期。

为虑及销路,书稿一直没有出版。巴金加盟文化生活出版社后,便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支付给立达书局 300 元将稿子取回,并在此基础上,加上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巴金的《神·鬼·人》等 6 本,出版了第一集《文学丛刊》。之后《文学丛刊》共出齐 10 集 160 本,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套文学丛书。

就在孕育《文学丛刊》的同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又策划了一套《译文丛书》。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其他一些丛书相比较,《译文丛书》有一个特点,即它实际上是在鲁迅的直接参与下诞生的。

4 | 办一套大型翻译丛书,拥有一个翻译和介绍外国优秀作品的阵地,是鲁迅多年的愿望。但由于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一心愿一直未能很好地实现。鲁迅在致孟十还的信中便说:“近十年来年中,设译社,编丛书的事情,做过四五回。先前比现在还要‘年富力强’,真是拼命地做,然而结果不但不好,还弄得焦头烂额。”^①关于《译文丛书》,原本是交由《译文》杂志的发行者生活书店出版的,但因为一些具体问题,计划搁浅。就在这时,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年轻人是怀着一颗透明、纯洁的心,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行着自己的人格奉献。他们想为文化事业尽一份力发一份热,他们因此与鲁迅走到了一起。其实,在商谈创办《译文丛书》之前,文化生活出版社同鲁迅就已经有过接触。这就是当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后不久,就将其中一本纪德的《田园交响乐》送给鲁迅,并由黄源向鲁迅约稿。鲁迅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精神很赞赏,高兴地答应把自己译的《俄罗斯童话》交由文化

① 鲁迅《致孟十还》(1934 年 12 月 4 日),《鲁迅书信集》67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生活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鲁迅还亲自为《俄罗斯童话》撰写了文辞绝妙的广告词,进一步扩大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所出丛书的影响力。对于一家新生的小小规模的出版社来说,鲁迅的支持无疑给了他们巨大的信心。这正如当朋友问巴金是什么力量使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编务那么多年时,巴金的回答那样:“一是当时(30年代)的新文学(进步的)和外国文学名著都不吃香,出版商认为赚不了钱,根本不重视,所以想在这方面做点贡献;二是这一想法得到前辈作家鲁迅和茅盾的支持。”^① 对此,吴朗西也说:“想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草创时期的情况,我就不能不想起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对我们的鼓励与支持。”^② 正是鲁迅与茅盾两位文学前辈的关怀,使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些想认认真真做点事的年轻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鲁迅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关系更加密切,友谊更加深厚。1935年9月11日,黄源写信给鲁迅,邀请他去南京饭店吃饭,商谈有关《译文丛书》的出版事宜,鲁迅欣然前往。这次会面正式确定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并确定出版的第一本书即是鲁迅译的《死魂灵》。茅盾也出席了这次会面,由他翻译的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状况的《桃园》则是这套丛书的第二本。至此,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第三套丛书正式出版了。一年内出版了三种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可以说已经规模初具了。

① 陈思和《余思牧和他的〈作家巴金〉》,《写在子夜》1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纪申《记巴金及其他——感想·印象·回忆》12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